

※「魏晉南北朝周邊形象」專輯※

華夏以外——「魏晉南北朝周邊形象」 專輯導言

劉苑如*

「魏晉南北朝周邊形象」專輯源自於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的同名計畫(2020-2022)，旨在突破漢人中心視野，還原魏晉南北朝多民族、諸國頻繁往來的歷史現實，解構中國傳統「絕域多怪物」的偏見。本專輯為了充實相關研究，又徵集了國內、外文史專家的論文，一共收了三篇論文，以及一篇〈魏晉南北朝周邊民族大事年表〉，試圖建立更多元的周邊形象。

魏晉南北朝本就是族群大遷移的時代，由於五胡占有中原，大批的北人南遷，促使南方的邊境加速開發。同時，在南北政治、經濟連橫的需要下，中原與江南政權都與周邊族群互動頻繁，以致周邊族群的族源、疆域、語言與文化，及其交通、交流，在此一時期都成為無可避免的議題。舉凡從事魏晉南北朝研究者，或多或少都會觸碰「異族」或「異域」，此一課題即學界所謂的「漢與非漢」，乃從漢民族立場觀看周邊民族的文化。縱使這些族群難免會有興衰起伏，並未連動「中土」的朝代更迭，其變化自有節奏，常須上溯秦漢，下則觸及隋唐，甚至遠遠綿延至近現代，才能有比較完整的敘事。連帶的，此一時期的邊疆族群研究，其範圍也會延伸，都會上下牽動中古早期，甚或下探近現代者亦時有所見。

歷來針對魏晉南北朝周邊民族的研究，從南方而北方、東北直到西域，皆已有民族研究的相關專著，主要研究早期如馬長壽(1907-1971)、內田吟風(1907-?)、林幹(1916-2017)、劉義棠(1926-1998)，晚近則愈多，凡有周偉洲(1940-?)、姚大力、陳琳國、曹永年、毋有江、魏國忠、楊軍、李慶新、邱炫煜、張平、榮

* 劉苑如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。

新江……，學術成果累積豐富。而主題式研究則如羅新的《中古北族名號研究》(2009)，透過分析對中古時期北方民族在政治名號的結構、功能、性質及變遷等，揭示其政治發展的階段性與連續性；二〇一九年集結出版的《王化與山險：中古邊裔論集》，收錄關於中古時期邊疆族裔問題的論文凡二十九篇，即在傳統史料外，充分運用簡牘、石刻等新材料，其深入的解析悠遊於邊裔與中心、想像與史實，卓具新意。

然而這些具有啟發的前行者，仍必須回溯至陳寅恪。他早已指出，中古史研究的兩大核心論題，實集中於「種族」與「文化」¹。相較於羅香林等早期民族研究者，其間互有異同，即在於不追隨以種族考古調查的潮流，而致力梳理中原漢族與各民族之間的複雜關係，闡釋不同民族對傳統文化體系的貢獻。余英時曾概括其學三變：從「殊族之文，塞外之史」、「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」到「心史」。其中「殊族之文，塞外之史」，意指以藏文、梵文及中亞語言考證佛典譯本，以及中亞、西亞外族與漢族的交涉，根底就在以中國西北史地之學參與歐洲東方學的新潮流；而「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」所重則在為中世史畫出一個整體的新圖，其中有分量的論文如〈支愍度學說考〉、〈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〉，單冊刊行則有《隋唐制度》、《唐代政治史》及《元白詩箋證稿》，此三部專題研究皆由個別史實的處理，擴展到貫通整體與推源溯流，既強調民族的融合，也不忽略統治集團的重要作用²。

新一代的族群研究者值得注意的，首推王明珂《華夏邊緣—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》，該書旨在建立現代的族群理論，反省過去以血緣、語言、文化和地域等現實條件作為民族界線的方法；採取工具論者(instrumentalists)的觀點，將「族群認同」視為人類資源競爭的工具，也就是藉由共同稱號、族源歷史，並以某些體質、語言、宗教或文化特徵，強調內部的一致性、階序性，從而對外設定族群邊界以排除他人。隨著內外政治、經濟環境的改變，資源分配、分享關係也隨之變化，造成

¹ 見陳寅恪：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》，收入陳美延編：《陳寅恪集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11年），第4冊，頁183。而新版《陳寅恪集》的《讀書劄記》和備課筆記、講義之中，種族與文化常是最受關注的問題，有助於進一步探究陳寅恪的種族文化史觀，以及這種史觀背後的學術轉型背景。詳參劉後濱、張耐冬：〈陳寅恪的士大夫情結與學術取向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第23期（2003年9月），頁358。

² 余英時：〈陳寅恪史學三變〉，《中國文化》第15-16期（1997年12月），頁1-19。

個人或整個族群或民族的認同變遷³。此書可謂中國族群研究典範轉移的奠基之作。除了現代性的知識反思，戴昇還歸納此書所發展的分析概念：「文類—模式化敘事—歷史心性—現實情境」，亦即不因疑古而放棄古人遺留下的文本書寫，反而善用模式化的敘事，將其概括為「弟兄祖先歷史心性」與「英雄祖先歷史心性」，並分析其背後人們的真實意圖與現實情境⁴。對於一向習以文本與敘事為重心的中文學界，也別具意義。

儘管陳寅恪很早就放棄「殊族之文，塞外之史」的東方學研究進路，但不表示不重視此一領域的研究，反而不得不承認國外漢學傳統有其優勢。本專輯的第一篇論文，由紐西蘭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語言與文化學院講師 Michael Churchman 撰寫，本所博士後研究人員黃文儀翻譯的〈中間地帶的人群：漢至隋代的俚與獠〉（“The People in Between”: The Li and Lao from the Han to the Sui），即是結合東南亞與中國歷史、東南亞語言及考古之作。主要處理六朝時期俚—獠（或稱烏潯）的居民，儘管一如民族學者所發現的，文獻中的族群名稱常是不穩定，考古與歷史資料也時常有所牴觸。但作者化繁為簡，專以侗台語系為主，以分布在東京灣（Tongking Gulf）以北，珠江與紅河流域之間（約現今廣東、廣西南方海岸，延伸至紅河平原東部與珠江三角洲西部、南部）的人群為對象，試圖打破夾處於華夏與越南主流的國族敘事，還原早在西元前一、二世紀原受漢帝國統治且置縣管理的族群，在東漢晚期以後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威脅力量。

其關鍵就在俚—獠地區銅鼓的發現，反映該區存在一定程度的財富，盛產金銀銅礦；另一方面也暗示一個地方首領傳統的存在，乃與周遭珍珠、珊瑚、熱帶水果、翠羽、香料等奢侈品的中心地區（包括紅河三角洲地區），由帝國任命官吏的體系相當不同。然魏晉南北朝時期，前往紅河三角洲的主要陸路，乃是直接穿越銅鼓生產最為集中的核心地區，即是必須通過一個獨立、好戰並且「野蠻」的民族的領土。因此六朝時期，南方朝廷曾發動多次針對晉康、越州、鬱林、新州與番禺俚、獠人的攻擊，並藉由委任權威給俚—獠首領，試圖將其納入帝國行政體系，卻又難以長期的控制。

³ 見王明珂：《華夏邊緣—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》（增訂本）（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3-6。

⁴ 見戴昇：〈族群歷史與社會記憶的重構——論王明珂的民族史研究〉，《廣西民族研究》，2020年第6期，頁123。

正由於俚一獠的不妥協，促成了交趾地方領袖內部一股自治潮流的誕生與發展，並憑藉幾世紀以來富裕且人口眾多的紅河三角洲，得與六朝帝國之間直接、規律的交流，從而在十世紀完成了大越王國的獨立建國。

第二篇為國立臺灣大學「趨勢人文與科技講座」博士後研究員朱先敏的〈求道、靖邊與流浪——重探《水經注》「域外」書寫〉，則是對於域外書寫文獻的雙重解構，探討原以兼具實地考察、文獻考據著稱的《水經注》，如何運用「言則依實」的求法行記《佛國記》，以及「實錄性質」的地理方志《林邑記》和俞益期與韓康伯之書等材料，重構超越北魏南朝控制的疆域——也即是〈河水注〉中恆河流域與〈溫水注〉中林邑國的印象。

作者首先以阿耨達太山將描寫對象從中原拉往印度。論證酈道元將法顯旅程中漫長的經歷、人與人之間的遇合、旅途中的誘惑全都裁去，只留下渡新頭河那道天險，並經由片段式援引僧侶求道的見聞，作為河道沿岸的補充和佐證，進而承接他們對異地的感官和記憶，結合文中對當地人們富足祥和的敘述，證成此地因佛法昌盛而百姓安樂的狀態；將求法之旅視為實地見聞，轉換成不在場的讀者唯一所知的地理事實。另一方面，酈氏搜集少數能企及遠方的漢人對於日南、林邑、扶南以外的描述，特別是隨軍前往攻打林邑的漢族文人書寫的林邑地志，一概將地志作者的文獻考察視為自然與事實，透過鬱水的河道流向，將敘述從牂柯帶往林邑，鉤畫出林邑人如何乘地利之便，搭配著城牆、武器，將天險轉化成攻守之勢，區隔為對立雙方的阻礙和抗拒，並充斥著各種戰爭記憶。觸目所見的熱帶動物，連鳴聲都是「警嘯」，視野也為漫天的孔雀所阻斷；而神祠鬼塔則與無市里、寡人居、海岸蕭條的觀察結合在一起，建構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異國印象。於是林邑人的文化差異，成為「染同夷化」的敘述、「舊風變異」的觀察，以及「非生人所安」的評斷。

若說即使「在場」的行記、地志作者本身已有個人觀察的限制、情感的選擇，然則酈道元作為一位「不在場」的地志作者，透過自己的剪裁拼貼，再一次凸顯這些主觀的描述及片段的認知，最終導致了主觀感受成為客觀知識，而地理書寫也成為地理事實。在書寫當下的語境、情景、立場和修辭被淡忘，成就了漢族文人對他鄉異國的認識和記憶。凡此都促使讀者反思，書寫不可能是完全的「地理事實」，必須透過咀嚼品味其親臨現場者歸來後的回音，或許才是認知異域的一種真實。

有別於個別民族的研究，第三篇由劉苑如團隊共同完成的〈有無之間：魏晉南北朝正史諸夷傳風俗與物力敘述的遠讀與細讀〉，試圖「擱置」既有的華夏中心

論，還原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亞洲，乃處於一個多民族、多政權並立的時期 (multi-states period) 的面貌。其方法兼用數位人文的遠讀和細讀，不僅藉由魏晉南北朝九部史書的諸夷傳的數位文本探勘、權威詞屬性標注及階層分類，同時也試圖提煉出有、無、異、同的周邊敘述為輔助，最後聚焦在代表民情好尚的風俗與賴以生存的物產研究，以探索文本中「他者」的知識建構，並解析華夏標準的濾鏡後的周邊意象。

一如王明珂模式化敘事分析，首先探勘有、無、異、同的「敘述語法」，經由文本分析發現，「異同類比」敘述中，比較的對象常以華夏居冠。除此之外，高句麗最常被當作類比的對象，參照對象或為百濟，或為夫餘，由此顯現對照國族間常有血緣、地緣或競合關係。另一方面，在「有無敘述」方面，往往集中在風俗、物力、地理及制度的有無，進一步觀察其正負屬性與標記類別，即能發現正向敘述以物力類 (75) 最多，而負向敘述則集中於制度類 (47) 與風俗類 (46)。其中的潛化語，「有」可作為一個國家富饒與先進的判斷基準，「無」則作為一個國家落後的判斷基準。再實際觀察相關數據，這類有 / 無語法常集中在東方諸國的倭 (16/13)、高句麗 (14/14)、扶桑 (13/10)、百濟 (13/5)、三韓 (9/9)、夫餘 (8/2)；其次則是西方諸國的吐谷渾 (17/8)、波斯 (16/1)、高昌 (15/0)、焉耆 (11/4)、宕昌 (2/9)。由此形塑文本中既帶有華夏之「我」見，又包含真實周邊「他者」的知識。

如何進一步解構周邊國族的風俗和物產的內涵，該文採取的策略就是將風俗物力敘述轉換成標記的中性數值，並從量化的統計圖表上呈現變動的趨勢，觀察各國族出現在這個時期歷史舞臺的多寡。屬於正面敘述的物力比較單純，魏晉南北朝正史諸夷傳對於四方諸國的認識，往往先建立在農殖林獵、釀造紡織、工業製造等等食貨的敘述上，又以農業生產居首；其次為畜產，又以馬匹最為重要，特別是北方、西方與東方國家的論述，涉及交通運輸用途，甚至決定其征戰的實力；而西方、南方諸國的礦產也不容小覷，以金、銀、銅、鐵、朱砂、錫、玉等為最大宗，並擴及對一些特有的資源，如沉香、古貝、瑇瑁寶物的記錄，這些物產不但可為民生器具、武器及貿易資源，也具有其宗教象徵的意義。而兼具正反兩面評價的風俗，則須做較多的破解。在十九個風俗子目中，以數量來說，依序是服飾（一般服飾、禮儀服飾，184）、宗教祭祀 (147)、居所 (121)、民風 (114)、佛教 (87)、語言 (83)、婚嫁 (72)、喪葬 (70)、飲食 (69)……。其中服飾、居所、婚嫁、喪葬，不僅是文化創造、禮制規範，也都是與物質條件、審美精神和社會生產力相關，最可見

其國力的展現。其中又以服飾為周邊諸國最為明顯、普遍的特徵，四方國族各有特色，而名列前茅的國族，如高句麗(12)、百濟(12)、吐谷渾(10)、林邑(9)、室韋(7)、波斯(6)等，即使非衣冠之國，也代表已經是具有相當財富和影響力的國家。另一方面，居所的記載幾乎可與服飾敘述分庭抗禮，但普遍敘述得較簡短，形式則各自配合環境條件而建。至於婚姻和死亡，則是重要的生命禮儀中的節點，婚、喪禮俗都是為了適應特殊群體，因應其歷史、地理、宗教的背景而形成的方式。在周邊民族的喪葬敘述中，以葬法為大宗，兼及喪期和喪禮等內容；其中葬法可分為天葬、火葬、土葬、水葬，亦有兼用不同葬法的二次葬。在北方諸國以天葬為主，西方諸國則是以土葬為主，東方諸國幾乎全部為土葬，南方諸國則是以火葬為主。而婚嫁敘述中，包括媒合、婚聘、迎娶、家庭結構等內容，一般與華夏略同。然西方的吐谷渾、宕昌、康國、附國、稽胡為收繼婚，北方室韋與靺鞨遺留搶奪婚的遺風。東方高句麗則比較類似北方婚俗，南方則同姓可婚，婚禮上請婆羅門祝福，成婚後要與父親分財別居。凡此看似不同華夏、看似野蠻的負面敘述，從其社會結構和經濟來說，卻是在特定的自然條件下，因地制宜，存異隨俗，以延續其國祚。其中婚嫁涉及繁衍子孫，擴大社會關係，有助於維持後嗣的數量和財產的完整性。而喪葬聯繫生者與死者，再次凝聚親屬及親情，不僅整齊了世間秩序，也完善了鬼神世界。若說觀風俗而知「薄厚」；但薄厚不僅是風俗道德高低的問題，也涉及「他者」賴以生存的基礎。

儘管中國古典文獻澱積出歷史記憶的想像，雜糅為虛實交錯的異域印象，在中國知識世界建構出「想像的異國」；然該文結合了文本標記的遠讀與風俗物力的細讀，經由數據的統計和視覺化，以及敘述語法的挖掘，大致皆能印證魏晉南北朝正史裏互為參照體系的諸夷書寫。特別透過風俗中的婚嫁、喪葬儀式和服飾象徵，以及豐饒物產的數據證明，正可節制華夏的主觀判斷，呈現多元變動的周邊世界。

第四篇由李嘉浩編纂，黃文儀博士審訂的〈魏晉南北朝周邊民族大事年表〉，乃是「魏晉南北朝周邊形象計畫」的副產品。該年表以《三國志》、《晉書》、《宋書》、《南齊書》、《梁書》、《魏書》、《周書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九部史書中的諸夷傳，以及《資治通鑑》為主，輯錄當中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周邊國族的起源傳說、往來互動、征戰攻伐、政權交替四方面的歷史事件，並參考現代學者所著的通史、斷代史、研究專著和工具書，方便讀者閱覽三至七世紀的諸夷動向，也作為本專輯的背景資料。

事實上，儘管現代學術的累積日趨豐富，學術交流也日益方便，但誠如陳寅恪指出的，東方學的門檻頗高，在語言、理論和文獻的條件外，甚至涉及田野和考古。本專輯即有意透過不同的個案，呈現此一學門的多重樣態，從而展現其多元形象。更重要的是在傳統的研究模式外，加入「數位人文」的方法，其所提供細節的歸類、紮實的數據……，是否可以藉此省思人文學與科學之間，並非衝突、不協調，反而是彼此互補互益的。如此就有可能突破傳統的門檻，統合細讀與遠讀於一，既有文學文本解讀的敏感度，也有數據的堅強支持。此一進路既新且具有未來性，可以協助魏晉南北朝研究者更容易親近「周邊」民族的研究，而反省制式化的「中心與邊緣」的局限，就有機會從邊緣反觀中心與中央。

